

说说汉语中的极数词

●王玉红 宋晖

“极数词”是指数值极大或数值极小的数词。表示数值极大的数词称为“极大数”，表示数值极小的数词称为“极小数”。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极大数可能是“兆”“亿”等，也许还会有人想到“古戈尔”。“古戈尔”是“Googol”的汉语译词，指1后面有100个0。那么，汉语自身的词汇体系中有没有比“兆”“亿”更大的极数词？有没有用来表示极小数的极数词？答案都是肯定的。

汉语词汇体系不仅有比“兆”“亿”更大的极大数，而且词汇的数量还很丰富。“极大数”的概念自古有之，《易经·系辞上》：“极数知来之谓占。”汉语文献中也记载了丰富的极大数。

甲骨卜辞中有“三万”的记载，这是早期的一个极大数。“万(萬)”字取象于蝎子，代表东宫苍龙。中国古代的“真龙天子”与“万岁”基本是等义词。

西周已有“亿”“兆”“经(京)”“垓”这样的词，如史书《国语》：“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垓极。”东汉《数术记遗》和北周《五经算术》对极大数的记载近似：“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谓‘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也。三者者，谓‘上、中、下’也。”这段记载可从三方面解读：

第一，极大数的词汇是成体系的，当时已有10个词语可以表示“万”以上的极大数，即“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第二，当时有三种进制系统，下数是十进制制，十万为亿(105)，十亿为兆(106)，十兆为京

(107)，以此类推；中数体系采用八位进制(万万进制)，万万为亿(108)，万万亿为兆(1016)，万万兆为京(1024)，以此类推；上数系统采用平方进制，万万为亿(108)，亿亿为兆(1016)，兆兆为京(1024)，以此类推。第三，极大数在不同的进制系统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亿”在下数系统中是“十万”，在中数系统中是“万万”。

更有趣的是，也有学者认为，上数系统借鉴了佛教经典《华严经》中的数词体系。在清朝康熙年间组织编纂的文献《数理精蕴》中，除了有“恒沙河”“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等极大数。有学者认为，这些数词来源于佛教。从已有中土文献和佛经梵汉对勘材料来看，汉语中还有一些极数词源自其他语言，受到梵语或梵汉翻译方式的影响。比如，佛经中的“六十数”，是十进位的计数系统，数值从100依次到1059。再如，“过数”“过是数”“过此数”都是极大数。东晋时期秦高僧鸠摩罗什译《华手经》卷十云：“菩萨闻诸佛名，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若千、若万、若过是数，一时专念，尽现在前。”

极大数也见于其他文献。比如，《南齐书·武帝纪》的“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全后魏文》的“亿兆来苏，天龙虔仰”，《二十五史·清史稿》的“授几仪成，三千黄发盈庭，今古何人见此曾，亿兆京垓燕屡行”。根据学者杨伯峻的研究，近代汉语中还有“半垓”的说法，意思是“五千万”，这个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表示极大数的极数词。这些极大数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

在表示极大数的极数词中，“兆”和“亿”所表示的数值有不同解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兆”有两个释义：一百万；古代指一万亿。“亿”有两个释义：一万万；古代指十万。这样一来，古代的“兆”比现代的“亿”大。古代的“兆”还可以表示“百万”“万亿”等，学者汪化云认为这是汉语进制演变中的混杂现象。为此，学界一直呼吁应该确定“兆”的具体意义，以便于科技和工业等国民经济行业。

“极大数”系统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2023年5月20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4个国际单位制新词头中文名称，其中两个是极大数：容[那](ronna，1027)、昆[它](quetta，1030)。这不仅是国际单位制的新现象，更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极数词的新成员。

除了表示极大数的极数词，汉语中也有丰富的表示极小数的极数词。在《数理精蕴》中，除了极大数之外，还记载了极小数。比个位小的极小数，按十分之一递减，依次为：分、厘、毫、丝、忽、微、纤、渺、漠、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静。

上述极小数中，目前还有数词义的有“分”“厘”“毫”“丝”“微”。比如，“分米”是十分之一米，“厘米”是百分之一米，“毫米”是千分之一米。有些极小数作为数目的意义虽然不广为人知，但在《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中还能看到相关释义。比如，《康熙字典》里说“一氂为一忽，十忽为一丝”；《现代汉语词典》现在对“丝”的解释仍然有一条释义是，“表示长度、重量的单位，10忽等于1丝，10丝等于1毫”。

大部分极小数的数目义已经不再为众人所知，多已虚化成形容词或副词，言指其小或者甚少，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纤”的解释是“细小”。至于其他的极小数词则进入汉语语言系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须臾”“瞬息”“弹指”等在诗书中随处可见，如《荀子·劝学篇》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李白《咏槿》的“芬荣何天促，零落在瞬息”，唐代诗人殷尧藩《端午日》的“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苏轼《赤壁赋》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毛泽东《念奴娇·井冈山》的“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似天渊翻覆”。

2023年新颁布的国际单位制中文名称也包括两个极小数：柔[托](ronto，10-27)、亏[科托](quecto，10-30)。汉语中有极为丰富的表示极大数和极小数的极数词，反映了中华先民对数字的认识，体现了古人在追求无限与面对未知时浪漫想象力。当然，极数词也丰富了汉语表达，让汉语的词汇系统和表达系统更加丰富多彩。正如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所言：“汉语中，数字的运用富于民族特色，充满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反映了华夏民族的传统宇宙观、美学观和民俗观。”

汉语中有极为丰富的表示极大数和极小数的极数词，反映了中华先民对数字的认识，体现了古人在追求无限与面对未知时浪漫想象力。当然，极数词也丰富了汉语表达，让汉语的词汇系统和表达系统更加丰富多彩。正如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所言：“汉语中，数字的运用富于民族特色，充满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反映了华夏民族的传统宇宙观、美学观和民俗观。”

挂钩、带子、皮囊，分别挂、系或盛装佩刀、刀子、砺石、契齿针(刻字的书刀)、哆厥(解绳结的锥子)、竹筒(装文件等物)和火石。

虽然唐制所规定的蹀躞七事是五品以上武官的“标配”，但是其变通型样式也为文官们采用，甚至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女子也多有佩戴。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俑就佩戴着蹀躞七事；据《新唐书》记载，唐高宗举行宴会，太平公主佩戴蹀躞七事献舞，高宗和武后连夸时尚。其实，唐代公主未必各个都和男人一样佩带蹀躞七事。它常常用来形容公主们走路、跳舞时，环佩、步摇叮当作响。

蹀躞、囀瑟，原是偏褒义，后来逐渐有了贬义，专用来讽刺获得一些不值一提的成就或做成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就得得意忘形的人。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就像骄傲一词，就有偏褒义的自豪之义和偏贬义的自满了了不起之义。

文言蹀躞(dié xiè)，口语嘒瑟(dè se)，原指一种左右晃动的细碎步。最初是萨满巫师为摇响腰间佩戴的铃铛之类法器，而故作张扬的得意步态，迄今那达慕大会蒙古摔跤手出场时，依然如此左右晃动，以示必胜信心。

蹀躞满志之人，走路往往蹀躞。谨小慎微之人，哪里敢蹀躞。人如此，马也不例外。拼命狂奔之马，顾不上蹀躞。赛马奋蹄，两只前脚同时使劲往前伸展，两只后脚同时用力向后猛蹬，称不上蹀躞。

潇洒矫健之马，有余力蹀躞。走马似舞，两侧之脚各自前后伸展，对侧来回交替。中国西北浩门马、岔口驿马、焉耆马出生后，往往自然会走这种蹀躞的对侧步，故有“胎里走”之称。武威雷台出土之行空天马，正是如此超越风神龙雀的蹀躞之马。正所谓“超越龙雀等闲事，天马得意一蹀躞”。过去，人们把它叫做“铜奔马”，其实，它并没有“奔跑”。它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易·系辞上》)之潇洒的对侧步，充满了轻盈的节奏韵律。这是庄子逍遥的神游，这是汉唐舞马的蹀躞，这是“自然凌翥”“神行电迈”“若灭若没”“绝尘弭轡”的玄天运道，即使是风神龙雀，也无法望其项背。把它叫做“奔马”，实在贬低了迈对侧步之蹀躞神马。

说蹀躞

●陇菲

器的牛皮腰带，故有“蹀躞七事”之说。

粟特骑兵都是萨满教徒，他们根据战争需要，调整了蹀躞七事中荷囊里装载的物品。他们的腰带上挂着弯刀、尖刀、弓、箭等五种武器和两个萨满教徒必备的护身符。粟特骑兵的蹀躞七事非常方便作战。

民族交融，胡服骑射，蹀躞七事后来被唐朝设为国家制服。根据唐代官制，五品以上的武官佩戴朝廷专门制作的皮革腰带，腰带上会有金饰，还挂着重用金属或皮革制成的



宋佚名《江亭晚眺图》

王晓玉供图

宋人的生活，既有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大雅事，也有徘徊于名山胜景，步行于都市园圃的游赏活动，是谓游赏之乐。

游赏的丰富场域

什么是“游赏”呢？“游赏”是古人从事出游、休闲、观光等活动的代称，相近的词语还有“嬉游”“遨游”“赏观”等。这些词语常见于文人笔记、诗话和地方志等文献中。宋元之际的文人笔记中，“游赏”一词描绘的多是近距离的出游活动。这一点，与今天的城市徒步、城郊旅游相似。如南宋《嘉泰吴兴志》载：“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衍，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缺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竟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这则材料记载了湖州地区设立专门的苑囿供人游赏，出游的目的在于通过亲近自然的方式，舒展性情。特别是春季百花盛开的时节，游人如织，极为热闹。

游赏活动并非湖州地区所独有，而是各地区共有的风俗。宋代的开封、洛阳、杭州、苏州、绍兴等地也都建有园圃与园林，供人游赏。园圃多指种植果木菜蔬的园地，园林则是融入山水、植物、假山

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在他看来，自然、城市是宋人游赏的两大空间，而南京、杭州地区则兼有山水自然与城市繁华之美。

就自然山水而言，嵩山、庐山、麻姑山、石钟山、衡山、泰山、峨眉山、武夷山、青城山、西湖、洞庭湖、镜湖等名山胜景已经成为宋人游赏的重要空间。山林之中，通常又有寺观、古迹、亭台等供游人休憩。城市之游，既有车马笙箫、奇花异草、夜市等给游人带来视觉与审美体验，也有酒楼、茶馆、园林等作为游人休闲的特定空间。史籍所载的宋代名园就有瑞圣园、聚景园、独乐园、沈氏园亭、真州东园等，这些名园为游赏活动提供了上佳场域。

游赏者大抵好花

花卉，是宋人游赏的重中之重。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中，宋人尝试着以花为媒，为游人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审美体验。

洛阳牡丹盛开之际，是游赏活动最繁盛之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曾言：“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贩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这是说洛阳之人大多都是喜欢花的，这并非文人风雅，而是时人普遍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洛阳人会在古寺废宅之地，有水、有楼台之处搭建帐篷，营造一个观赏鲜花的空间，现场通常伴有美妙的音乐表演。据《墨庄漫录》记载，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洛阳地区还会举办万花会。万花会上，牡丹花或作为屏帐，或点缀于房梁、房柱之上，或插花于桌案，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满目皆花的空间。这种风尚也被扬州地区效仿，只不过万花会上的品种以芍药代替。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与宋人一起置身于缤纷多彩的万花会上，聆听动人心弦的音乐，感受鲜花的馥郁芬芳。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区的花卉游赏活动并不限于牡丹。如欧阳修《玉楼春》词中有“洛阳正值芳菲节，秣艳清香相间发”“杏花红处青兰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句，说的是春季的洛阳，各色花卉交相辉映，空气中弥漫着花的清香，此时络绎不绝的游人或于城中，或于山间遍赏芳菲。理学家邵雍也写了大量的诗作，记录他春夏秋三季在洛阳地区的赏花活动。正月赏梅云“五岭梅花迎腊开，三川正月赏寒梅”，二月寻芳则言“二月方当烂漫时，翠华未幸春无依。绿杨阴里寻芳遍，红杏香中带醉归”。又有“三月牡丹方盛开，鼓声多处是亭台”，“七月芙蓉正烂开，东南园近日徘徊”，“九月风光虽已暮，中园景物未全衰。眼观秋色千万里，手把黄花三两枝”。

除了以花卉草木为主的休闲体验，游赏活动还融入了诗歌创作、古物赏玩等雅集活动，饮酒、点茶等消费活动。如《观林诗话》记载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文人观梅作诗的雅集活动：“都下旧无红梅，一贵人家始移植，盛开，召士大夫燕赏，皆有诗，号《红梅集》，传于世。”又如《梦粱录》记载了位于杭州地区的蒋苑住宅常举办的游赏活动，其特色在于融汇花木欣赏、文物赏玩、茶饮消费等多种活动于一体：“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园，亭台花木，最为丰盛，每岁春月，放人游玩，堂宇内顿放买卖关扑，并体内庭规式，如龙船、闹竿、花篮、花工……官窑碗碟，列古玩具，铺列堂右……汤茶粗细，车儿排设进呈之器，桃村杏酒肆肆，装成乡落之景。数亩之地，观者如市。”可以说，宋代游赏活动既是一种以视听体验为特色的娱乐活动，也兼文化交流、日常消费等多种元素于一体。

诗词谱录中的游赏

游赏活动丰富了宋人日常生活，同时也推动了诗词、谱系学等门类知识的发展。司马光《巨游》所谓“游人恋山水，日晏遑忘归”的审美愉悦与情感体验常见于宋人笔端。他们常把游赏活动见到

清代方大湜晚年所撰《平言义》中，曾记载有清代官员石家绍的从政箴言：“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石家绍自号曰“民佣”，其作为和德行，对从政者如何施政履职有不少借鉴意义。

佣，本义指受雇佣，出卖劳动力，引申指佣仆，即佣人，仆役。为民佣就是做人民的“佣人”和“仆役”，为民众做好服务。在官与民的认识上，唐代柳宗元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他任永州司马时为好友写下临别赠言《送薛义序》，“赠言第一句就指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在柳宗元看来，为官之人是民众所雇佣来的，就是民众的“佣人”和“仆役”。为官从政就要为老百姓做事，绝不能尸位素餐，不干事、乱干事，甚至为非作歹干坏事。

甘为民佣者最任事。古人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为官首要“知其职”，内心对自己定位准确，才能够视民事如己事，尽职尽责，殚精竭虑，事事用心、时时尽力。元代郭守敬自幼“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履职尽责，勤奋敬业、无愧俸禄，所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和治理的河流数以百计，被称赞为“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从政者应时刻牢记自身职责，常怀忧虑之心，一日不可懈怠，唯恐所作所为不称职、不尽职，有心如此，方能造福一方。倘若忘了本分，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官员，也得不到百姓的认可。

甘为“民之佣”，方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与支持。朱德60岁生日时，董必武写下贺诗，称赞朱老总“半生戎马为人民”“甘为民办耻为官”，道尽了他甘为公仆、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他这种对待人民的态度也给后辈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彭德怀同志也曾提出告诫：“我们要像扫把一样为人民服务，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并带头身体力行。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涵养“民之佣”的自我认知和行为自觉，牢记服务人民之责、无私奉献之德、勤政廉政之要，坚定理想信念，擦亮“民之佣”的公仆本色，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样才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and 人民的期盼。

甘为『民之佣』

●王梁宇

中，苏轼介绍了沈立《牡丹记》的内容，包括栽培种植之法和古今记录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进行了考究和记录，第二部分则以收集古今诗赋、小说中的“牡丹”形象为主。这种写作体例也见于其他作品，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分为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一则详细记载了牡丹的品种、种植法、外形、养花之法等，二则梳理了文学作品对牡丹的书写。可以说，游赏活动为宋人的日常生活注入了审美化的体验，而这种审美意趣又与文人的诗词创作、学者的探究目光融合。对游赏的喜爱，激发了宋人记录、呈现、探究自然之美的热情，也为后人走进宋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提供了一扇窗。



宋佚名《春游晚归图》 王晓玉供图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王晓玉供图

宋人的游赏之乐

●王晓玉